

关于創立民族文字和建立 标准語的問題

蘇聯 謝尔久琴柯教授著

民 族 出 版 社

書號：741 (1) 030

**關於創立民族文字和
建立標準語的問題**

蘇聯 謝尔久琴柯教授著

劉湧泉等譯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國子監街2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7號

中央民族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1956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850種×1168種 1/32 268千字 印張9.7 插頁1

印數：1—6,200冊 定價：五角六分

統一書號：8049·3

(內部發行)

關於創立民族文字和建立 標準語的問題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顧問
中 央 民 族 學 院

謝尔久琴柯教授著

刘 湧 泉 等 譯

(內 部 發 行)

民 族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Советник Института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АН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
Проф. Г. П. Сердюченко

О созда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письменностей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языков

Пекин 1956

序

本書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蘇聯各民族文字創制史的簡明教程。這個教程是我在1954——55學年期間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爲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中央民族學院和北京大學的教師和研究生所講的。這個教程是我于1951——53年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所做的工作的基礎上寫成的。第二部分是我在中國各個語文會議上的報告和發言。

不論是教程的講稿，還是報告的翻譯工作都是由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的同志集体完成的，其中特別是刘湧泉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是我在講課和作報告中、同樣在準備本書的出版工作中的一个經常的助手。此外傅懋勣教授和馬学良教授也曾審閱了一部分譯稿。

茲當本書刊印之際，謹向所有這些在工作中給我幫助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

格·謝尔久琴柯教授

1956年·北京

目 錄

序

第一部分：有關蘇聯各民族文字創制史的問題

導 言	9
一 俄國沙皇制度在民族語言問題上的政策	13
二 沙皇俄國時代進步的文化活動家對民族語言問題的看法	18
三 共產黨的民族語言政策的一般原則	22
四 阿拉伯文和舊蒙文字母	28
五 蘇聯創立拉丁化文字的時期	42
六 蘇聯東干族拉丁化文字以及三十年代初期在蘇聯制定的 漢語拉丁化文字	51
七 土耳其文字拉丁化	67
八 創立拉丁化文字時所犯的錯誤和轉用俄文字母的原因	69
九 俄文字母的優點以及革命前和蘇維埃時代東方各族語言 對它的應用	82
十 音位理論在創立文字中的作用	96
十一 以俄文字母爲基礎而創立的蘇聯各族文字和新蒙文	110
(1) 埃文基文字母	
(2) 烏茲別克文字母	
(3) 維吾爾文字母	
(4) 納納英文字母	
(5) 一種莫爾多瓦文字母	
(6) 阿巴津文字母	
(7) 東干文字母	
(8) 蒙文字母	

十二 問題解答	129
---------------	-----

第二部分：報告與發言

僮族文字同僮語的基礎方言和標準音問題	145
(在桂西僮文研究指導委員會座談會上的發言)	

關於中國文字的幾個問題	157
(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報告)	

漢語標準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則	176
(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的報告)	

蘇聯建立和發展標準語的經驗	203
(在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上的報告)	

論新蒙文	236
(在蒙古語族語言科學討論會上的報告)	

論少數民族學校中的民族語言教學	262
(在第二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上的報告)	

附錄一：注音字母、俄文、英文、法文、德文、國際音標的漢語語音對譯表 (以北京音爲準)	297
---	-----

附錄二：俄文、英文、法文、德文、國際音標、注音字母的漢語音節對譯表 (以北京音爲準)	300
---	-----

譯后記	315
-----------	-----

第一部分



有關蘇聯各民族文字創制史的問題

導 言

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是隨着人類社會的出現而產生的，隨着人的意識的產生而產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語言和意識同樣古老”，“語言跟意識一樣，只是因為需要，因為迫切需要和別人交際才產生的。”（註一）列寧把語言叫做“人們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列寧對於認識過程中語言和思維相互關係的問題非常重視，因此對作為“組成認識論和辯證法的那些知識領域”之一的語言史賦與特殊重要的意義。斯大林說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

可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來看，語言的主要功用是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交際工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人的思想是在人們相互交際的過程中藉助語言而產生和實現的。斯大林在這一點上指出：人的思想“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礎上、在語言的辯證和詞句底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註二）。

因此，語言一方面是人們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時是構成思想的工具；語言把人的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每個

（註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0—21頁。

（註二）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頁。

人都很清楚，如果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與自然力的鬥爭中，在為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鬥爭中調協其共同活動，便不可能在人類社會生產活動中獲得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

斯大林公正地指出：“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註一）

語言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這種作用更加巨大了，因為蘇聯千百萬不同民族和說不同語言的人積極參加了社會政治生活，參加了發展社會經濟和文化政治生活的活動。

文字問題在語言學問題當中佔有重要位置。文字的歷史和語言的歷史以及和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有密切聯繫。正因為如此，文字問題一向不僅引起語言學家的關心，而且還引起歷史學家，特別是文化歷史學家的關心。在其他一些跟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相聯繫的因素當中，文字對語言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現代的科學証明：現代語言的要素還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就已奠下基礎了。那時語言是不複雜的，基本詞彙是很貧乏的，但是有它的語法結構，雖然這種結構是很原始的，但總算是語法結構。

生產不斷的往前發展和改進，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當然都使語言的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

文字的產生和發展通常是不斷影響語言的變化和發展的。當然，文字所表達的那個語言也會影響文字。語言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的特點時常規定文字的性質，也就是規定有各種不同變體的表意文字、音節文字、字母文字的性質。

蘇聯在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領導下，進行了為蘇聯許多不同語言的各族人民創制和改進文字的工作，這一項工作是史無前例的，同時

（註一）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35年版，第46頁。

具有不可估計的社會、政治和科學的意義；這一項工作曾用去了許多科學家和實地工作者——語言學家、教育學家和出版工作人員——很大的勞力。

和改革舊字母及創制新字母相聯系着的是：研究要創制文字的語言的各種方言（有時數目是很多的），並首先是整理出語言中存在的音位（Фонема），也就是說整理出用來區分意義和詞的形式的基本語音。如果事先對那些還沒有文字的語言的各個方言未作研究，那就不能解決選擇標準方言（註一）（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диалект）的問題，不能解決字母的問題。制定正字法和術語不僅要嚴格地估計到語音的特點，而且要估計到一切詞彙、語法的，換句話說就是結構的特點。創制民族的文字——這是發展標準（書面）語（литературный(письменный)язык)的第一步。

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的繁榮，用幾十種不同語言寫作的一批一批的新作家不斷參加到文學的行列裏來，這些都鮮明地證實了下面這一事實：蘇聯很多說不同語言的民族在蘇維埃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創制新文字和改革舊文字的工作對發展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在蘇維埃國家裏，曾進行過用拉丁文字母制定的文字來代替古阿拉伯文和舊蒙文字母的運動，從這一運動的發生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字後來又普遍地廢除了拉丁字母，轉用俄文字母，這一事件的開始到現在也已經十五年多了。

蘇聯民族語言工作的豐富經驗是蘇聯各族人民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文化，也就是民族語言的文化成長和繁榮的巨大指標之一。這些經驗老早就已受到外國的極端重視，首先是歐洲和亞洲的人民民主國家的重視。蘇聯的經驗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它已經對蒙古人民共和國語言文字的發展有了不少好的影響；目前偉大的中國各族人民和正在跟美帝國主義侵略作英勇鬥爭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疑地也希望利用這些經驗。

因此，在我的講課裏除了簡短地、系統地敘述一下蘇聯創制和發

（註一）即基礎方言。——譯者註

展新的以及發展已經改進過的民族文字的歷史之外，同時也描述一下蘇聯在解決文字的一些問題上所給與東方個別國家的那些好的影響。

一 俄國沙皇制度在民族語言問題上的政策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說好幾十種語言的民族居住在它的領土上。這些語言大多數只是蘇聯有。其中有東部斯拉夫語言，波羅的語言，高加索語言，北方各族人民的語言，此外還包括所謂原古亞細亞語言（Палеазиатские языки），絕大部分的突厥語，烏喀爾芬蘭語和通古斯滿洲語，有不少的伊朗語和蒙古語，阿爾明尼亞語和其他一些語言。

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爆發之前的年代裏，現今已加入蘇維埃聯盟的各族人民曾經是處在經濟文化發展的各個不同的階段。同時，由於沙皇制度對沙皇俄國邊疆各民族和說各種語言的居民施行了民族壓迫和不平等的政策，很多民族那時是居於非常低的發展階段。

各民族生活當中的無數事實證明：沙皇制度爲了使大衆處於奴隸和愚昧無知的境地，有意識地在俄國邊疆培植宗法封建壓迫。沙皇制度不僅排擠，而且有時乾脆就取消地方的學校、戲院和一些教育機構，它所以這樣做的目的在於使人民大衆愚昧無知。沙皇制度杜絕了地方居民先進代表的一切主動性，它打擊了邊疆人民羣衆的一切積極性，這一切便促成了地方居民對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極端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有時便變成了敵對態度。

沙皇制度是如何對那些能够促進俄羅斯帝國各族人民的語言、文化和自覺有所發展和高的活動進行迫害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們有很多各種各樣的材料可以用來說明。一八六三年，沙皇大臣瓦盧耶夫在談到用烏克蘭語進行教學的學校時，他曾宣佈烏克蘭語“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政府這個特別的命令發布不久，烏克蘭語就在學校、法庭、戲院、出版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方機關裏禁止使用了。直到沙皇制度統治的最後幾年，還對於用烏克蘭文出版書籍一事進行一切可能的限制。一九〇五年，尼古拉第二（Николай II）在內閣提出的有關取消限制使用“小俄羅斯”語出版書籍的呈子上加

了如下的批語：“等待時機”（註一）。一九一三年的時候，國家杜馬曾就烏克蘭的學校問題，討論了烏克蘭語可能使用的範圍問題。列寧在他的“尼康（Никон）主教是如何保護烏克蘭人的”（註二）一文中揭露了國家杜馬在提出這一問題上的赤裸裸的民族主義的、黑幫派的本質。

想在家庭範圍之外使用別洛露西亞語的任何願望都受到了系統的迫害，不僅如此，別洛露西亞語有一度竟被說成是“不存在的”；曾經對立陶宛語和波蘭語也進行過一切可能的和長期的限制，儘管像波蘭語這樣的語言是擁有古老文化的語言，是擁有千百萬人口的語言。

民族壓迫和強制俄羅斯化的政策對於所有沒有文字的“異族”（Инородец）曾經是十分普遍地施行的，在這些所謂的“異族”中有伏爾加沿岸、西伯利亞、高加索、蘇聯北部、中亞細亞的各個民族，以及其他很多民族。

正如國民教育部許多文件中所敘述的那樣：學校裏所以承認非俄羅斯居民的本族語言，是因為要使它們充當進行“基督教教育和使異族兒童全盤俄羅斯化”（註三）的不可缺少的準備工具。

只有宗教的書籍才許可譯成本地居民的語言。“連贊同大量翻譯和用異族各方言出版書籍的念頭也是不允許的。然而出版那些包括聖神歷史事件的新約四福音書和基督教教義，可以有例外。”（註四）沙皇政府一方面阻礙帝俄各民族邊區的經濟發展，而另一方面在文化領域內千方百計地阻礙當地語言和文學的發展。我們在國民教育部的指示文件裏可以看到這樣的字句：“企圖給那些從來還沒有文字和文學

（註一）參看《東方文化和文字》，第四卷（1930年巴庫出版）“關於沙皇制度異族文字政策的資料”一文。

（註二）《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341—342頁。列寧揭露了尼康主教那些要求的全部醜惡的、黑幫派的內幕。尼康主教曾宣佈：“烏克蘭人民並不尋找那種聲名狼藉的自治和恢復德涅泊河下流之查波洛什哥薩克組織之所在地，烏克蘭人並不是分離主義者，烏克蘭人不是異族，他們是自己的人，是我們的親兄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不應該把他們限制在語言上，限制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上，不然，我們就要把自己的兄弟看成和猶太人，波蘭人和格魯吉亞人等的真正異族一樣了。”

（註三）《異族教育問題論文和文件集》，1869年聖彼得堡版。

（註四）同上，第17頁。

發展的方言創制文字，並使其在文學上有些發展，企圖把這些方言提高到學校和教會語言的水平，這不會引起助長其慾望的不可避免的後果嗎？要知道語言就是民族。你肯定語言的文字，使它得到文學加工，說明它的語法規律，並在教堂和學校裏使用這種語言，因而你就要肯定和發展他們為相應的民族。”（註一）

“異族”學校最迫切和最主要的任務是進行“基督教教育”，這樣就會“使學生們在出校之後，既成為善良的基督教徒又成為善良的俄羅斯人”（註二）。

“國民教育部公報”這個官方刊物曾露骨地寫道：“我們不關心韃靼人、楚瓦什人和馬里人識字教育的發展（當然其他方面也是一樣——作者）和這些方言的文學加工。我們所關心的僅僅是他們的基督教教育，（儘管開始時還需藉助於他們原有的方言進行這種教育），以及把他們教育成懂俄語和俄文的人”。（註三）

列寧在“論國民教育部的政策問題”（註四）這篇文章裏痛斥了國民教育部所執行的“愚弄國民意識”的政策，（註五）這個教育部的名稱列寧極其恰當地寫作：“國民‘教育’（請原諒我這樣稱呼）部”（註六）。

政府的這個政策是和上層統治階級以及俄國黑幫貴族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在斯托雷平反動的日子裏，“忠良”的貴族在其第七屆代表大會上關於“異族”學校和教育的政策曾作過這樣規定，在代表大會的文件上寫道：“學校是國家的，學校應成為俄羅斯民族愛國主義的學校。政府的學校不可能具有異族的特徵。

在學校裏，國語應毫無折扣地佔統治地位，必需用俄語進行教學。要知道俄國是一個各種不同部族的集合體。難道我們將有意識地力求建立部族的分離主義，讓各個部族都表現這種分離主義嗎？我們貴族

（註一）《異族教育問題論文和文件集》，1869年聖彼得堡版，第16頁。

（註二）同上，第20頁。

（註三）同上，第52頁。

（註四）《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113—132頁。

（註五）同上，第113頁。

（註六）同上。